

神法、 公社和政府： 德国农民战争的 政治目标

朱孝远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96
Z510.32
2

神法、公社和政府： 德国农民战争的政治目标

朱孝远 著

北京 大学出版社
北 京



C

161/21

新登字(京)15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法、公社和政府：德国农民战争的政治目标 朱孝远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ISBN 7-301-02595-5/K·185

I. 神…

II. 朱…

III. ①德国—中古史 ②中古史—德国 ③德国—农民战争

书名：神法、公社和政府：德国农民战争的政治目标

著作责任者：朱孝远

责任编辑：唐显凯

标准书号：ISBN 7-301-02595-5/K·185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话：出版部 2502015 发行部 2559712 编辑室 2502032

排印者：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

发行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625印张 250千字

1994年7月第一版 1994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0000—1,000册

定 价：9.90元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第二章 上士瓦本、法兰克尼亚和蒂罗尔的乡村社会	(14)
一 农村公社的发展	(15)
二 农业经济状况	(18)
三 领主、诸侯政府对农村的侵犯	(24)
四 小结	(34)
第三章 风暴的起落	(39)
一 运动的过程	(40)
二 农民战争的特点	(53)
第四章 革命文件：传单和小册子	(62)
一 什么是传单和小册子	(62)
二 传单和小册子所包含的信息	(65)
三 小结	(73)
第五章 神法：政治合法性的新基础	(77)
一 关于作者、成书的时间和地点	(79)
二 神法和政府	(84)
三 人民的共和政府	(91)
四 基督教之爱 and 公共利益	(95)
五 小结	(97)
第六章 盖斯迈尔的人民领地政府理想	(101)
一 盖斯迈尔和蒂罗尔革命	(101)
二 《蒂罗尔宪章》所反映的革命目标	(108)
三 小结	(117)
第七章 海尔高特的基督教公有社会	(120)

一 小册子作者海尔高特	(121)
二 海尔高特的“向基督教新生活的转化”	(123)
三 海尔高特的政府制度	(132)
四 海尔高特的“和平主义”	(136)
五 小结	(138)
第八章 路德宗教改革和德国农民战争	(141)
一 路德宗教改革的背景	(142)
二 路德宗教改革的政治目标	(148)
三 农民基督教和路德运动的不同性质	(153)
四 小结	(166)
第九章 德国农民战争与南部德国秩序	(170)
一 16 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	(171)
二 “普通人”期望建立地区自治政府	(176)
三 农民战争政治目标同帝国、诸侯和城市的冲突	(180)
四 小结	(191)
第十章 结论	(196)
附录一 《致全体德国农民书》	(208)
附录二 盖斯迈尔:《蒂罗尔宪章》	(234)
附录三 汉斯·海尔高特:《向基督教新生活的转化》	(239)
附录四 参考书目	(252)
附录五 中外文人名地名对照表	(261)

第一章 引言

1524—1526年间，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运动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南部地区蓬勃高涨。从西面的阿尔萨斯到东边的斯蒂里亚，从南面的蒂罗尔至北部的图林根，遍燃着战争烽火。成千上万的农民、市民、雇工、矿工、手工工匠、下层僧侣、小贵族和政府的秘书、公务员等联合了起来，他们高举神圣的《福音书》，英勇抗击贵族领主的残暴压迫。当城堡、宫殿、修道院和诸侯住宅被付之一炬时，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显得那样软弱无力，僧俗贵族在农民面前被迫逃亡，帝国统治势力不得不为生死存亡而斗争。不久，当农民们被诸侯的雇佣军打败、屠杀和审判时，农民的一方显得单薄无助。当乡村中的农场、农民的房屋被火焰吞没时，那些关于基督教世界的美好向往，那些对兄弟之爱、友善、平等、正义和公正的追求，那些以《福音书》和基督教神法为指南、要求建立基督教人间天国的政治构思，似乎也与起义者崇高的斗争理想一起风飘云散了。但是历史却永远铭记了这场人民的革命运动。事件发生不久，一个同时代的人就称它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普通人的伟大起义”^[1]；革命导师恩格斯称它为“德国人民最伟大的革命尝试”^[2]；德国历史学家马克斯·斯坦恩梅茨断言它是“1918年11月革命之前德国人民最重要的革命的群众运动”^[3]；而另一个德国学者彼得·布瑞克则称它为“普通人的大革命”^[4]。

1525年的伟大运动虽然一直活在世界人民心中，这个运动却没有很好地为人们所理解。首先，起义者不是人们通常所想象的罗宾汉式的“绿林好汉”。起义者们有很好的纪律，他们佩带宝剑，身着盔甲，

扛着军旗，敲着军鼓，是一支支颇有军纪的队伍。这些队伍没有随意抢劫的习惯，而起义也不是为了一时的劫富济贫。他们的领袖中不乏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职业军人。这些纪律和军事风范告诉人们起义者不是捣乱的强盗，他们是为实现《福音书》上所说的真正的友爱、和平、忍耐、和谐而作战的真正的军人和基督教徒。他们要反对的是福音的死敌，要制止的是不敬神者的反基督行为。他们所具有的使命感、道德感和正义性，使他们完全不同于绿林兄弟。他们自称是基督教兄弟，肩负着重大的政治和道德使命。

第二种通常的误解是把起义看成一种单纯反对剥削的经济斗争，如认为起义者都是清一色绝对贫困的农民或农奴，这些人没有政治头脑，只是在遭受压迫情况下为寻找经济上的出路才揭竿而起的。他们没有推翻领主、诸侯封建统治的愿望。整个起义都是一种经济斗争。

这些有关起义的误解不仅仅存在于群众的观念之中，就是在专业的学术圈子里，也充满了对起义的奇谈怪论。早在起义结束后不久，就有两个同时代的作家断言是马丁·路德反对教会的福音运动诱发了农民起来反对他们的合法领主^[5]；农民们的起义仅仅是为了一些经济上的改善；^[6]这些农民非常残暴，他们滥杀无辜；除此之外毫无结果。^[7]这些观点直到上一个世纪还有人在不断地重复着。不过，本世纪的大多数的学者对此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参加1525年运动的那些农民是老百姓中有责任心的人们，而决不是罪犯；^[8]起义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活动；^[9]起义者们没有滥用暴力；革命有重要意义和积极后果。^[10]起义是下层人民一次政治行动，不仅仅是一场经济斗争。起义显示了人民大众对于社会、经济、政治和宗教的变化的看法和改变历史进程的企图。在宗教上，有的学者对农民起义是路德改革运动精神的产儿的说法提出异议，指出农民信仰的不是路德教，而是他们自己的基督教。^[11]

在现代专业学者力图对起义作出新的解释时，1525年运动本身

所提供的史料却好象一直同人们的新思路作对。1525 年运动的史料要么来自政府的档案及官员们对起义者的审判记录,要么来自同时代人对起义的转述。这些史料大都充满了对起义者的敌意,倾向于把起义说成是一次经济性质的抢劫,或一场没有目的的暴民运动。当然,研究者们还能看到一种珍贵的材料,即起义者自己撰写的、提交给贵族、领主和领地政府的怨情陈述书,它们作为档案被领主们保留了下来。这些怨情陈述书也具有局限性:它们只体现了运动初期的情况,而且它是一种请愿书,主要陈述的是农民怎样遭到领主贵族的非礼对待,他们怎样恭敬地恳请主人放松剥削缰绳,怎样要求恢复古老的习俗权利。如果贵族和领主能够接受他们的恳请,他们又是怎样愿意以恭敬态度服从主人的差遣,如交纳赋税和提供劳役。不用说,这些史料,无论来自于起义者的敌人还是来自起义者自己,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偏见。历史学家对这些史料进行收集、整理、批判、想象,就只能得出 1525 年运动是一农民反对贵族剥削的经济斗争的结论。

尽管存在着这些障碍,重新解释这一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1975 年,在德国和世界各地都举行了德国农民战争 450 周年的纪念活动。它的主要成果是两本研究德国农民战争的论文集的出版。论文集反映了德国历史学界研究农民战争的最新成果。另外还必须提到两本专著的问世,即德国学者豪斯特·布塞尔隆的《作为政治运动的德国农民战争》和在瑞士任教的德国学者彼得·布瑞克的《1525 年革命:关于德国农民战争的新概念》。更为重要的是,70 年代以来历史学家在整理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传单和小册子方面有了重大突破,在几万份传单中,有几百份是关于德国农民战争的。这些传单和小册子为研究者提供了一幅几乎是全新的图像,它揭示了 1525 年革命政治斗争的性质。这些传单反映了运动中、后期的情景,涉及到政治理论、政治局势分析、斗争步骤、人民政权建立及起义者政治、社会和宗教方面的理想。新史料的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研究德国农民战争史的新热潮。在本书付诸印刷的时候,整个宗教改革时代的传单和小

册子手稿的整理工作已经完毕，正以微型胶片的形式进行出版。^[12]

1975年后关于德国农民战争性质的众多解释中，有几种解释引起了我的思考。第一种解释是“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说”，以德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马克斯·斯坦恩梅茨、哥德·弗格勒等人代表。这一学说的源流可以追溯到恩格斯在1850年5至10月写成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在1850年，恩格斯曾认为农民革命同1848年革命有类似之处，因此德国人民具有革命传统。经济的改变导致阶级关系的沉浮，中产阶级出现并要求温和的政治改革，社会底层的农民也举行起义。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都是反对封建主义的；它们都要求扫除通向资本主义的障碍并建立德国的民族国家。^[13]此后，卡尔·考斯基、贝尔福特·巴克斯和M. M. 施美林等人又进行了探讨。斯坦恩梅茨等人把恩格斯的论述发展为一种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说，如斯坦恩梅茨和弗格勒都认为德国农民战争是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反映了社会和经济上的冲突，而另一个运动——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则是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在意识形态上的表达。^[14]

斯坦恩梅茨和弗格勒代表了德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德国农民战争的两种解释。斯坦恩梅茨认为宗教改革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共同构成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而以农民战争为其高潮。革命起于路德维滕贝格96论纲的提出，止于1525—1526年农民起义军的战败。^[15]他还认为革命有一个经济上的背景，即资本进入生产领域，工业资本投入矿业和纺织业，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剥削方式。商品货币又侵入农村，促使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化，引起了“再版农奴制”，这些都加重了农民负担，导致农民起义爆发。^[16]

弗格勒同样也认为德国农民战争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他强调封建主义结构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他认为15世纪农村的阶级斗争没有使人民摆脱封建主义剥削，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德国呈典型形态，也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弗格勒通过强调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在起源上的一致性，还企图证明两场

运动都起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生产方式的冲突。农业阶级无法摆脱封建剥削,封建剥削阶级又拒绝资本主义在德国发展,终于导致了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17]

弗格勒和斯坦恩梅茨的观点把德国农民战争同资本主义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也把德国农民战争和宗教改革运动联系起来。宗教改革同德国农民战争之间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就是程度上的激进与否或阶段上的高低之分。斯坦恩梅茨和弗格勒强调了宗教改革运动和农民战争起因上的一致性,但因农民有反封建的要求、在客观上又打击了封建主义,就把农民起义说成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还是过于勉强,似乎也不能很好概括德国农民战争和宗教改革两场运动的不同性质。

第二种解释来自于德国历史学家布塞尔隆,他认为“农民战争是一场政治运动”^[18]。这种观点是继承了德国历史学家哥德·弗兰茨的理论。弗兰茨于1933年提出一个论点:1525年的运动是农民古老的习惯法同领主的罗马法之间的冲突,根据习惯法村社拥有控制乡村事务的权力,而诸侯和领主企图通过罗马法颁布新的税和租佃方式来控制农民。^[19]弗兰茨认为德国农民战争有两个目标,一是“古之法”的恢复,即恢复农民的传统习俗所规定的权利;二是实现“神法”,弗兰茨认为这是一个1493年至1517年爆发在上莱茵地区的农民起义“鞋会运动”中提出的口号。弗兰茨不认为神法是直接来自于宗教改革运动,但他认为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是一“连接古法和神法的桥梁”,^[20]在农民运动从分散的地方运动发展为农民战争这一点上具有重要影响。按照弗兰茨的观点,真正的冲突发生在乡村组织和日益增长的领地政府之间,后者企图控制和干涉乡村事务。诸侯和贵族向农民征收新税、加重赋税和强化农奴制的法规。农民用两种办法来进行反抗:地方性的农民起义以恢复古法为目标,而在超越地方主义的范围中(如领地范围)则以“神法”为组织手段和斗争口号。^[21]

弗兰茨的论点被阿道夫·万斯等人推向了极端。1964年万斯出

版《农民追求正义的斗争：1300—1525》一书，提出农民战争是由乡村中的长老领导的，而他们是一些相当富裕的、受人尊敬的地方绅士。万斯于是认为农民生活的富裕化是德国农民战争的基础；富裕农民要求参与政治、取得与他们经济身份相符合的政治地位是起义爆发的原因。^[22]

布塞尔隆的观点与万斯有所不同，他也认为农民战争是一场政治运动，不过他强调的是“普通人”要求参与政治。他认为“1524—1525年间的请愿和纲领要求社会改革和减轻农民经济负担，要求众人之间政治平等。起义者要求拥有更多的农村和城镇的自治权。在地区范围内，他们承认领地政府的权威，但要求保证维护农民和市民的权利；有些地方如上士瓦本、蒂罗尔和萨尔斯堡，起义者的要求更进了一步，他们要废除皇帝以外的一切权威。”^[23]布塞尔隆还指出普通人的目标和计划已经超越了当时存在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理论的范围。在小的地方乡镇范围起义者要求的是加强自己权力的改革，在领地和帝国的范围，他们希望一种更高的、意义很抽象的政府重建。^[24]布塞尔隆的解释无疑抓住了农民反对贵族政治统治的实质，缺陷是仅强调农民有实行政治改革的意图，却没有具体阐述农民建立自己政权的政治目标。

“德国农民战争是一场政治运动”的说法得到美国学者大卫·塞宾和瑞士伯尔尼大学教授彼得·布瑞克等人的补充。他们认为这种说法忽略了社会和经济作用的重要性。他们警告说：“如果离开了社会和经济因素，德国农民战争根本无法理解。”^[25]塞宾通过对上士瓦本帝国城市拉文斯堡附近乡村的考察，不仅发现农民和地主、领主之间存在斗争，而且在有地农民和无地农民之间、本村人和外来人之间、以及自耕农、佃户和乡村中日益增多的计日短工之间也存在着斗争。这些斗争产生于人口增长后所造成的土地短缺。在上士瓦本，人们面临着日益加强的资源危机。塞宾认为这也是德国农民战争的一个重要经济背景。^[26]塞宾的发现鼓励了历史学家在上士瓦本地区以

外进行类似的调查,但发现在下阿尔萨斯并不存在类似的土地短缺问题和农民间的激烈斗争。^[27]塞宾的理论因此需要进一步论证。不过,这显示了学者们注重经济因素的倾向。

1975年布瑞克提出了“普通人大革命”的新解释。布瑞克认为1525年革命的原因主要是封建经济范围内的分配问题。封建贵族为了补偿他们在14世纪农业危机时受到的损失,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引起农民起义。他指出:“农民为参加政权而发动起义,希望用革命手段来克服封建主义的危机。”^[28]为此目的,他们成为现代国家的积极建造者。农民自下而上推动国家建设共分三个阶段——公社阶段、议会阶段和共和阶段。这种发展路线同自上而下的王权专制主义国家的发展正好形成鲜明对比。布瑞克把农民革命的政治目标解释成了克服封建主义的危机的斗争、议会斗争和建立共和政治。^[29]布瑞克的解释是一种大的综合:他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于经济社会的分析和阶级斗争说同弗兰茨·布塞尔隆“政治运动说”的解释相结合,建立了对德国农民战争比较复杂的解释。布瑞克的解释比较全面,但他太偏重农业危机的影响,如把1524—1526年革命解释成了农民和贵族为争夺产品分配额的斗争。布瑞克这样论述1525年革命的目标:“革命的社会目标是建立‘基督教共同体’、实现‘兄弟之爱’。被动看,这意味着限制特权等级的特权和权力。革命的政治目标是(在小政权林立的地方)谋求建立合作制的联邦制度;在大的领地政府管理的地方,谋求建立一种国会体制。由于改革力量的不足革命最终失败,但却使农业经济得到解放(各地情况十分不同);法律上有了安全保证;农民的政治权力走向制度化和稳定化。”^[30]

我对德国农民战争的研究兴趣开始于1985年,那时我在美国伊利诺斯州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从师于宗教改革史学者卡尔·塞迅教授。塞迅教授是当代英语世界中第一个研究德国农民战争的学者。出于对农民运动的偏见,自1933年德国学者弗兰茨的名著《德国农民战争》问世后,西方世界没有出版过一本有关农民战争的专著。但

是在原民主德国，在原苏联，关于德国农民战争的研究却持续不断，整理出不少有用的资料，写出了一批专著和论文。这一状况，西方的学者很不了解。塞迅教授认为必须改变西方学术界的这种既傲慢又无知的态度，他开始向西方学术界介绍恩格斯的观点和原民主德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他的介绍工作，最后汇编成一本名为《权威和宗教改革》的书籍。^[31]这是英语世界中自1933年以来重新关注德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起点。在塞迅教授开设的《欧洲宗教改革史》的研究生讨论课中，我开始进入了有关德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我当时的观点是十分机械的，出于对用人口增长解释德国农民战争的起源的做法的不满，我想用一种经济上的结构来说明是整个封建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农民生活的绝对贫困化，并因此而爆发革命。这个想法最后写成一篇学术论文，经塞迅教授的修改，最后发表在1988年的《中国历史学家》杂志上。这个时候，我已转入美国西部海岸的俄勒冈大学，从师于托马斯·A·布雷迪教授，攻读德国宗教改革史专业的研究生学位。

我之所以转入俄勒冈大学，主要是出于塞迅教授的热情推荐。这个时候布雷迪教授关于德国宗教改革史的研究工作，特别是他关于瑞士和德国斯特拉斯堡城的社会政治史方面的重要研究，已经引起了美国 and 整个西方学术界的深切注意。另外在德国农民战争研究的领域里，他还是布瑞克《1525年革命》一书的英文翻译者。布雷迪老师是布瑞克的朋友，他们是同时代人，在观点上也十分接近。所以事实上，布雷迪成了布瑞克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介绍者和解释者。在布雷迪老师那里，我首次接触到了有关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的传单和小册子。这些16世纪德文写成的手稿十分难以理解和读懂，所以阅读这些原始文献的过程也变成了我学习中古德语的过程。在这个时期，我意识到把德国农民战争理解为一场单纯的反剥削斗争过于简单化。在导师的指导下，我开始转向从政治角度来考察德国农民战争。是克服封建主义危机还是打破封建主义制度？是政治运动还是反对

剥削的经济斗争？是参政还是建立自己的人民政权？这是我考虑的三个中心问题。1990年我完成讨论农民政治心态的毕业论文。这就是本书的初稿。

本书的研究计划其实相当简单。第一章是导言，介绍本文的写作提纲。第二章分析南部德国士瓦本、法兰克尼亚和蒂罗尔的社会经济情况，以便考察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因素怎样使这些地区成了1525年运动的发源地。在第三章中，我对农民战争的过程进行叙述，并讨论农民战争过程中的一些特点。我认为1525年5月是个转折点，由于怨情陈述书的被拒绝，军事上的挫折和失败，各个社会集团对起义的态度变化等因素，促成了运动革命性的转向。农民起义者在政治上走向成熟，起义转变为推翻封建统治的政治革命。在第四章中，我开始介绍新的革命文献：传单和小册子。这些文献讨论了政治合法性和建立人民政权等问题，体现了运动的革命性转化，反映出请愿运动逐渐变成了一个推翻旧有封建制度的政治运动。

从第五章开始，政权问题的研究提到了议事日程。第五章讨论起义者关于政治合法性的思想和建立以神法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的理想。第六章讨论蒂罗尔革命和盖斯迈尔《蒂罗尔宪章》中所说的人民政权的性质。它表明建立人民政权已经成为1524—1526年革命的最主要的政治目标。第七章讨论另一种类型的农民政权——反映在海尔高特著作中的基督教神权国家，即没有私有制的“人间天国”。通过这三章的讨论，我想找出1524—1526年起义者所构思的人民政权的基本的类型、功能和性质。第八章将讨论路德宗教改革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的关系，涉及到路德改革的性质、神法的性质和农民基督教诸问题。既然已有那么多的学者讨论了1524—1526年运动意识形态上的起源，我们也应当对这个问题作一定的考察。起义者是一些“真正的基督教兄弟”，他们的组织称之为基督教联盟，尽管我不认为由于这些名称的关系，1524—1526年革命就是路德改革精神的产儿。农民的宗教改革运动基本上是一种独立的运动，激进的意识直接来自于

农民对《圣经》的理解和他们自己的生活状况。农民基督教在1524—1526年运动中是一种理论基础。第九章将讨论农民革命和德国民族国家的建立的关系,涉及到南部德国的政治秩序以及帝国改革、诸侯领地政府、城市运动和农民政治目标之间的复杂关系。第十章是结论,实际上只是对以上诸章作一简单归纳,讨论1524—1526年运动的特点和性质。我希望通过这样一种研究,明确1524—1526年革命的政治目标,以及这些目标怎样对1524—1526年以后的社会产生了一些实质性的影响。

在本书出版的时候,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塞迅教授(Kyle C. Sessions)、布雷迪教授(Thomas A. Brady, Jr.)。他们现在仍然分别在美国中西部的诺莫城和美国西海岸的加州伯克莱城从事欧洲宗教改革史方面的研究。是他们把我引向了德国农民战争史的复杂的思考。我还要感谢伊利诺斯州立大学的约翰·弗里德(John Freed)教授,是他帮助我树立了关于西方封建主义理论概念的理解。我要感谢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导师梅维斯·梅特教授、(Mavis Máté)西奥博尔德教授、(John Theibault))和亚历山大·墨菲教授(Alexander Munphy)的热心指点和帮助,他们为我的论文的写作提供了极其有用的批判性建设性意见。我特别要感激我的同学玛丽·安梯奥斯女士(Mary Anteaux),她在身患绝症的情况下,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阅读了我论文的全文,认真修订了每一页的英文文稿,她的智慧和热情,她的对于生命的深刻的理解和永恒的爱,将永远活在一个中国留学生的心中。在这里我要向静静安息在太平洋彼岸的她,献上我的深深的敬意。我还要表达我对热心帮助和鼓励我的中国史研究专家约瑟夫·爱希里克教授(Josoph Esherick),他的常用的中文名字是周锡瑞,表达我的深深的谢意,感谢他对我的一惯的支持和帮助。我要向我的老师辛西娅·布罗卡教授(Cynthia Brokaw)、杰克·梅迪克斯教授(Jack Maddex)、麦高文教授(Randall McGowen)、丹尼·鲍坡教授(Daniel Pope)和乔治·绪雷德教授(George Sheridan)表

达我深深的谢意。我要向俄勒冈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秘书和朋友凯瑟琳·海辛女士(Cathering Heising)、卡罗尔·布瑞希特女士(Carol Pritchett)和拉瓦尼·诺门女士(LaVerne Norman)表达我由衷的感谢。感谢她们的友谊、鼓励和热情帮助。最后,我要特别向德国历史学家瑞士伯尔尼大学的彼得·布瑞克教授(Peter Blickle)和德国洪堡大学的哥德·弗格勒教授(Gunther Vogler)表示我的衷心的感谢,他们为本论文写作提供了宝贵意见和非常有用的资料。

本书能够出版,要特别感谢和归功于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的吴同瑞老师和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史编辑室老师们的热情帮助。我要特别感谢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导师马克尧先生,没有他的热情鼓励和帮助,本书不可能完成。马老师以极认真的态度为我批阅全部手稿,帮助我修正了许多理解上的错误和行文中的失误,这对于全文的最后定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最后,我要向我母校的老师們:向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老师们、伊利诺斯州立大学历史系的老师们、俄勒冈大学历史系的老师们和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老师们,表达我衷心的感谢。

【注释】

[1] "An Unsympathetic View of the Peasant Movement: From Sebastian Franck's Chronicle," Gerald Strauss, ed./trans., *Manifestations of Discontent in Germany on the Eve of the Reformation* (Bloomington and London, 1971), 166.

[2] Friedrich Engels, *The Peasant War in Germany*, ed., Leonard Krieger (Chicago and London, 1967), 409.

[3] Max Steinmetz, "Theses on the Early Bourgeois Revolution in Germany, 1476—1535," in Bob [i.e., Robert W.] Scribner and Gerhard Benecke, eds., *The German Peasant War of 1525 — New Viewpoints*, (London, 1979), 9.

[4] Peter Blickle, "The 'Peasant War' as the Revolution of the Common Man," in *ibid.*, 19.

[5] Bob Scribner, "Introduction," in Scribner and Benecke, *German Peasant War*, 3.

- [6] For examples, see "An Unsympathetic View of the Peasant Movement: From Sebastian Frank's Chronicle," in *Manifestations of Discontent*, 167; Louis Maimbourg, *Histoire du Luthéranisme* (Paris, 1681), 25-27.
- [7] *Ibid.*, 167.
- [8] See Blickle, "The 'Peasant War' as the Revolution of the Common Man-Theses," in Scribner and Benecke, *German Peasant War*, 19-22.
- [9] See Siegfried Hoyer "Arms and Military Organization in the German Peasant War," in Scribner and Benecke, *German Peasant War*, 98-108.
- [10] Peter Blickle believes that "although the revolution failed because of its incompatibility with Reformation, the results were economic relief for agriculture, gains in legal security, and a stabi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political powers of the peasants." Peter Blickle, "The 'Peasant War' as the Revolution of the Common Man-Theses," in *ibid.*, 19.
- [11] See Heiko A. Oberman, "Die Gelehrten die Verkehrten: Popular Response to Learned Culture in the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in Steven Ozment, ed., *Religion & Cultur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Publishers Inc., 1989), pp. 43-64.
- [12] See Steven Ozment, "Pamphlet Literature of the German Reformation", in Ozment, ed., *Reformation Europe: A Guide to Research*, (St. Louis, 1982), pp. 85-106.
- [13] Engels, *Peasant War in Germany*; for an interpretation of Engels' view, see A. G. Dickens and John M. Tonkin, *The Reformation in Historical Thought* (Cambridge, MA., 1985), 239-240.
- [14] Scribner, "Introduction," in Scribner and Benecke, *German Peasant War*, 3.
- [15] Max Steinmetz, "Theses on the Early Bourgeois Revolution in Germany, 1476-1535," in Scribner and Benecke, *German Peasant War*, 10.
- [16] Max Steinmetz, "Die frühbürgerliche Revolution," 45, see also Blickle, *Revolution of 1525*, 3-7.
- [17] Blickle, *Revolution of 1525*, 7.
- [18] Buszello, *Der deutsche Bauernkrieg* (Berlin, 1969); also see his "The Common Man's View of the State in the German Peasant War," in Scribner and Benecke, *German Peasant War*, 109-122.
- [19] Franz, *Der Deutsche Bauernkrieg*, 137.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Blick-